

社会运动的策略与后果

□李钧鹏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美国纽约 10027)

摘要:在社会运动研究中,主流政治过程理论的结构主义倾向与狭隘的政治关注面经常遭致批评。对这些缺陷的修正并不在于抛弃“政治契机结构”概念,而是拓宽契机的类型,包括政治契机、经济契机和话语契机,并将其动态化为行动的一部分。这一论点以计算机回收运动为案例,其重大成就同它与经济、政治和话语契机结构之间的灵活互动密切相关。

关键词:社会运动;政治契机;经济契机;话语契机;政治契机结构

一、社会运动的后果

何谓社会运动的后果?传统研究者一般将一场社会运动的结果与它所设定的公开目标进行比照。一场社会运动有没有完成它最初订立的目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似乎可以说,这场运动取得了成功。甘姆森(W. Gamson)的《社会运动的策略》被奉为对社会运动的策略选项与“成败”之间因果关联的最经典研究,它考察了1800~1945年53个美国社会运动群体,发现社会运动的规模、组织结构、激励机制、暴力手段等内在因素与运动的“成败”直接相关。^[1]

“成败”固然是测度社会运动后果的一个便捷指标,但在经验研究中遇到了许多问题。首先,何谓成功?任何对成功的定义必须厘清三个维度:在何种意义上成功?对谁而言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而上述三者皆为高度主观化的判断。成败并非简单的二元分立,下述场景完全有可能成立:一场社会运动没有实现它预定的公开目标,却仍然获得了实质性收益;反之亦然。不仅如此,许多社会运动产生了意料之外的积极后果。后者是否应当被归类为“成功”抑或“失败”,答案并不明朗。其次,社会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任何一场运动都涉及诸多行动者,其视角和理解必然存在差异。第三,社会运动的目标从什么阶段开始算起?社会运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不同阶段的目标往往不尽一致。第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社会运动的成功

归因于上述内在因素?对社会运动成败的现有研究往往只考察某一个案,至多几个个案,其有效性和可归纳性都值得商榷。由于甘姆森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宏观社会影响因素,很难说他笔下的“成功”特质专属于“成功的”运动,而“失败的”运动与另一套特质有关。事实上,后续研究经常得出互相冲突的结论。例如,甘姆森指出,破坏性运动比和平运动更有可能实现目标,但索尔(S. Soule)等人对美国妇女运动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第五,运动策略与运动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了质疑。例如,戈德斯通(J. Goldstone)发现,甘姆森所列的内在因素事实上与这些运动群体的成败呈负相关关系,并认为历史时序性才是预测社会运动后果的真正变量。^[3]

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社会运动具有广泛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影响,并倡导以一种更为开放的视角来考察社会运动的后果。希普舍(P. Hipsher)检验了社会运动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4]阿曼塔(E. Amenta)倡导研究社会运动所代表民众的集体利益。^[5]雷伯恩(N. Raeburn)考察了同性恋运动如何影响公司的雇佣行为;^[6]里德(T. V. Reed)展示了社会运动在文化与审美方面的影响;^[7]罗哈斯(F. Rojas)研究了黑人民权运动在黑人研究学科的制度化中所作出的贡献。^[8]

二、契机与行动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政治过程理论占据了30

收稿日期:2011-06-12

作者日期:李钧鹏(1978-),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年的范式地位。1970年代末以来,研究的关注点从运动的参与者转向外生因素。研究者相信,社会运动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国家结构的重构与政治形势的变动,这启发了一系列跨越不同地理和政治范畴的经验研究;而“政治契机”或“政治契机结构”概念也被广为采用,其核心理念是:一场社会运动的后果可以被归因于其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动,包括主流的、制度内政治系统的相对开放,支撑政体的精英联盟的稳定程度,相关精英分子的结盟以及国家镇压的能力与意愿。

然而,始于1990年代末期,政治过程理论似乎开始对知识积累形成威胁。研究者对政治契机概念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它注重结构而忽略主体行为,注重政治而忽略文化,注重理性而忽略情感,注重群体而忽略个人。而最受人诟病的是政治契机包容一切的倾向,如甘姆森和迈耶(D. Meyer)所警告,“政治契机结构概念正处于麻烦之中,有可能变成一块吸收社会运动环境一切方面的海绵,包括政治制度与文化、各种危机、政治联盟以及政策变动”^[9]。如果一切有利于社会运动的因素都被贴上“契机”的标签,政治过程理论就有寿终正寝之虞。

就方法论而言,在政治契机与运动后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同样会误入歧途。首先,政治契机在解释链中的角色经常被错置。这一概念本意是用来预测社会运动的产生,但许多学者将运动产生与运动后果混为一体。例如,谢(Xie)和范德海登(Van der Heijden)认为“政治契机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运动在政治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同影响”^[10],在这里,因变量变成了社会运动的后果。如果政治契机的“开放”导致社会运动的出现,而政策或其他领域的变动随之产生,后果当然可以被追溯至契机,但政治契机的独立角色往往难以分离,宣称契机和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就具有误导性。其次,政治契机对新社会运动的解释力极其有限。政治契机理论假定社会运动具有政治目标,将国家或其他政治力量视为被挑战的对象,但当代社会运动正逐渐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与文化维度。

本文提出一种包括政治契机、经济契机与话语契机的新类型学,并以美国计算机回收运动为例来加以阐述。政治契机指有可能弱化国家镇压潜在挑战者的能力或意愿的政治系统结构变动,而这种变动可能来自扩大化的社会不满、减弱的国家政治合法性、政治精英的分裂、全球政治冲突的扩散或增强的政治多元化。经济契机包括两个

方面:社会运动组织的物质资源与被挑战者经济收益与成本的比较。资源动员理论告诉我们,成功的社会运动往往具有较高程度的组织能力、较为完善的组织结构以及较为丰富的可利用物质资源;^[11]而当一场社会运动的主张被其挑战对象视为代表了公众诉求时,经济契机就相应产生。如果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政治或经济契机,后者将毫无意义;结构上的契机必须由主观知觉和评估作为中介。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脱离社会情境来理解政治过程——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互构关系。当社会对一场运动具有足够的意识形态或情感支持,当“我们必须有所行动”或“我们能够做到”这种信念开始蔓延时,话语契机随之产生。在话语契机结构这个场域中,不同的行动者争夺界定和架设议题的权利(与权力)。更具体地,话语契机取决于三个变量:可见度,即社会运动的主张被大众媒介覆盖的程度;共鸣度,即包括被挑战者、参与者、盟友和旁观者在内的不同行动者对社会运动主张的反应程度;合法度,即社会运动所获支持程度。^[12]换言之,如欲取得预期成果,社会运动或其主张必须为公众所知,主张必须为公众所认同,运动必须在多数公众眼中具有正义性。

表 社会运动的契机

| 契机 | 组成 |
|------|--|
| 政治契机 | 对政治权威不满程度的增加 弱化的国家政治合法性 政治精英的分裂 全球政治动荡的扩散 政治多元化的增强 |
| 经济契机 | 组织架构 市场竞争 |
| 话语契机 | 可见度 公民度 合法度 |

政治过程理论过度的结构主义倾向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不少研究发现,政治结构的客观变动与对契机的主观觉察之间并不总是互相吻合。结构上的契机有可能出现,却没有被觉察到;封闭的契机结构却有可能被运动参与者视为开放。契机并非本体意义上的物自体,等待行动者的触摸和摄取。事实上,社会运动研究中所有对契机的分析都是一种事后表述;时序性只具有一元维度,而历史是无法被实验的,从而用契机本身来解释后果就有可能落入循环论证或套套逻辑的陷阱。下文的案例将阐明,契机只能被置于社会行动的框架内来理解。契机是被创造出来的,产生于行动之中;契机并不以一种单向度的方式发挥作用,而是处

在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和互构之中;契机永远由社会运动参与者的主观觉察所“过滤”,是不同行动者之间充斥策略的社会互动的产物。一场社会运动如果能有机地参与进政治动态之中,并构筑其政治合法性,它就可以克服并“打通”相对封闭的政治契机结构。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企业对公共形象和利润的关注有可能为社会运动提供独特的经济契机。通过调动市场的力量,社会运动可以将消费需求从“落后分子”的产品转至“先进分子”的产品,从而改造一个市场,而这反过来有可能对被挑战企业形成压力,有助于运动的主张被企业采纳。社会运动引发了一个开放的场域,其中的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架构议题,传播相应的信息。有利的话语契机结构能够传播社会运动的信息和主张,有利于它们被纳入议事日程。

三、计算机回收运动及其后果

电子废弃物大致包括剩余、过时、被丢弃或损毁的电子设备,它正成为全球环保运动的一个新关注点。美国2007年所产生的3.73亿单位的“退役”消费者电子产品共重约225.17万吨,其中82%都遭到了废弃,大部分被直接倾倒入土壤中。在这3.73亿单位(225.17万吨)电子产品中,其中2.06亿单位(132.19万吨)是计算机产品。具有相当毒性的电子废弃物在1990年代初开始引起美国环保团体的注意,但一直到最近,随着计算机回收运动的兴起,它才被认定为是一场具有全球性的环境危机。

计算机回收运动(简称CTBC)现已演变为电子产品回收联盟,它是一个分散化的、松散的运动联盟,由草根回收网络与硅谷毒性物品联盟(简称SVTC)共同协调。前者是一个自然资源保护组织,后者则是一个环境健康团体。2001年,CTBC由美国和加拿大的一小群倡导环境健康和缩减废弃物的活动分子组成,一些劳工组织和环保意识较强的投资者也随后加入。这场运动的早期领导团体包括播种基金会、加州居民反废弃物组织、清洁制造网络、洁水行动、美国传播工会、生态誓约网、地方自立研究所、未来材料基金会、汞问题政策项目、德州环保运动以及INFORM。^[13]据其官方网站,CTBC的目标是“保护电子产品使用者、工人和社区的健康和福利。在电子产品的生产和丢弃方面,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要求或强制性协议,促成消费者,电子类产品的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承担其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完全责任”。^[14]

关于美国全国计算机回收计划的情况,截至2008年,戴尔公司提供完全免费的全国性的计算机回收;惠普和苹果公司为部分用户或特定产品提供免费的计算机回收;华硕和东芝只对笔记本电脑的部分用户或特定产品提供免费的计算机回收;捷威和联想提供计算机回收,但消费者必须支付相关费用;优派只对购买延期保险的顾客提供计算机回收;宏基和NEC不提供计算机回收业务。另外,苹果公司一直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反对各州推进生产者回收计划的立法。

就州立法而言,截至2011年2月7日,美国50个州中的24个州(外加纽约市)已经通过了有关创立全州范围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计划的法案,尽管这些法案的细节差异很大。加州在2003年成为第一个通过电子废弃物法规的州,但目前却是唯一推行消费者付费法规的州,而其他23个州都执行消费者责任法规。

CTBC的影响还波及其他领域。例如,美国电子产品回收从1999年的14.9%增长至2007年的18.4%;全国性电子废弃物网络已经形成。尽管历史仍在延续,CTBC的巨大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反戴尔运动,2006年8月,戴尔公司公开地全力支持消费者责任立法,并开始在一些州推动立法试点。2006年10月,戴尔发起了美国电子产品公司中最彻底的回收计划,并声明它将在全世界任何地点无条件免费回收消费者手中的任何戴尔品牌产品。而在此之前,戴尔只在消费者购买一件新产品时才对旧计算机进行回收。在电子产品回收联盟最新公布的回收报告卡中,戴尔高居行业之首。尽管它被认为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已不再是环保运动的主要挑战对象。然而,前推至2001年,戴尔并没有为消费者提供免费产品回收。在戴尔公司态度转变的前前后后,CTBC的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架构议题

为什么以制造商为靶子,而没有紧盯零售商?首先,就销售而言,许多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企业已经将注意力从传统的零售通路转移至直销和定做,戴尔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一场社会运动如欲实现其目标,就必须获取其挑战对象的注意力。其次,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往往被视为对废弃计算机问题具有最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再者,公司形象与客户关系已成为生存和发展策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对制造商和品牌所有者直接施加压力有可能迫使他们基于利润方面的考虑而改变

其政策。第四,戴尔公司在美国个人电脑市场上处于领导地位。在2007年,戴尔拥有美国市场上最大的市场份额,达到了28%。不仅如此,戴尔公司还是高等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这两个销售市场的领袖,由此,较之于总人口,其客户的思想更为左倾,对环境关注更多,而这反过来对戴尔公司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迫使其对回收政策加以考虑。CTBC相信,如果他们能够迫使戴尔改变其政策,产业内的其他公司必将效仿。最后,戴尔被广泛视为对其他公司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并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契机,因为他们可以将计算机回收这一问题加以个人化。

包括政府机构与产业界在内,美国公众对废弃计算机的环境危害关注已久。然而,在1990年代,讨论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改善对寿终正寝的产品的处理方法上面。^[520]随着环境保护团体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引入美国,情况在世纪之交发生了变化。这项制度在1990年由瑞典率先倡导,并迅速扩散至欧洲各国。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生产者责任延伸是“一项环保政策手段,通过这种制度,生产者在实体或财务上对其产品的责任被延伸至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消费者阶段。当设计其产品时,生产者最小化生命周期影响,并接受环境影响上无法通过设计来消除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被视为接受这项责任。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一项主要职能是将废弃物管理的成本和实体责任从当地政府部门和公众身上完全或部分地转移至生产者”^[10]。在1990年代末期,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已经在欧洲被广泛采纳。

在2000~2002年,一个诸多环保团体的联盟开始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引入美国的公众辩论,而废弃计算机这一问题也超越了在其寿终正寝时回收的原有架构。CTBC的组织者指出:“如果非政府组织不来号召采取欧洲式的解决方式,议题将会被简单视作为电子废弃物的负责任管理来付款,而不是一个正视电子产品生命周期每个阶段后果的契机。”^[1520]

值得强调的是,美国联邦政府长期执行的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另一个版本——产品责任延伸制度。后者是一项自愿制度,核心思想是由包括消费者和政府机构在内的行动者共担产品责任。相应地,CTBC就面临着如何将产品责任延伸制度转变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问题。

除此之外,CTBC还有意识地从全球视角来自我架构。首先,自始至终,这场运动坚持对计算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在欧洲和美国的“双重标准”的严

厉质询。德州环保运动的执行主任施耐德(R. Schneider)说道:“在欧洲,戴尔公司对所有消费者的废弃设备进行免费回收。欧洲的生产者责任法规就这一点对公司有强制要求,这保证了其产品不被随意倾倒与焚化,且其有价值的原料得以被再利用或回收。我们对戴尔电脑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是:‘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的环境为什么要遭到二等公民的待遇?’”^[17]

其次,CTBC试图唤起电子废弃物由美国出口至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的公众意识。2002年,CTBC出品了纪录片《出口危害》,对电子废弃物的出口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评。CTBC不仅曝光了电子废弃物出口的丑闻,而且将其上升到伦理和道德的高度,引起了广泛关注。2003年9月,加州率先对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进行资助。2008年7月,美国联邦众议员格林(G. Green)与汤普森(M. Thompson)提出法案,反对允许电子废弃物出口至发展中国家的联邦政策,要求美国加入其他发达国家阵营,禁止电子废弃物贸易,并将《出口危害》列为其灵感之一。

五、应对不利政治契机

在世纪之交,CTBC并未面临特别开放的政治契机结构,不仅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被变体为产品责任延伸制度,而且1980年代以来里根及其继任者所推行对商业放松管制政策。CTBC首先参与创立了全国性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制度。这项行动始于2001年早期全国电子产品管理看管联盟(简称NEPSI)的成立。经过多次协调,CTBC及其盟友最终突破了计算机产业对其产品收取前期费用以融资回收的抵制。^[1521]同时,对电子产品再利用、回收和废弃进行管理的全国体系也正在形成。尽管由于财务方案上的争执,NEPSI在2004年解散,但它极大地促进了CTBC,赋予了后者极大的曝光度和合法性,而且它在一系列法案在美国诸州的提出和通过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否认的。最为重要的是,由于NEPSI的内部争执集中于特定的回收政策,更具体地表现在,多数电视机制造商和IBM主张推行后端费用,而惠普支持前端费用,CTBC将这种分裂视为一个潜在的政治经济契机,因为公司精英之间的分裂被看成是和政治精英之间的分裂同等重要,且CTBC获得了更为激进的回收行动的机会。

其次,CTBC组织了一系列针对戴尔以及整个计算机产业的活动。2001年11月,CTBC与SVTC共同发布了2001年计算机报告卡,作为其

全国范围内协调行动的第一步。它“追踪计算机和电子公司在社会与环保指标上的进展,包括原料政策、供应链管理、回收项目及其产品生命周期末端的管理”^[14]。在这项报告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公司的环保标准列表上,戴尔公司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著和尴尬的位置,并被批评为一个落后者,远远落后于其主要竞争对手惠普公司。这份包括媒体的同日发布以及18个都市地区的活动的报告发布会,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消费者和媒体的注意力,并受到上榜公司的密切关注。

CTBC将报告卡建构为一个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的问题,并强调戴尔公司相较于惠普公司的高回收标准的落后地位,这最终导致了戴尔公司废除其臭名昭著的监狱劳工关系。2003年6月,CTBC发布报告《双制度记》,将戴尔公司基于监狱的计算机回收项目与惠普和微粒金属公司长达七年的市场合作关系进行对比,并大肆渲染。在这份报告发布后一个星期不到,戴尔公司承认了顾客对其监狱劳工关系的责难,并宣布终止与相关单位的合作。

除此之外,CTBC还将戴尔公司在海外的回收政策与国内政策进行了对比:“戴尔对德国、瑞典、挪威、荷兰、丹麦和日本的消费者都提供计算机回收服务,遵照相关的环境规制要求,将计算机再利用、回收或以适当的手段丢弃。既然戴尔能够在这么多其他国家提供回收服务,并同时年复一年地获取足够利润,维持市场领袖地位,很难让人相信,戴尔无法在获利的同时,对其在美国制造的电子废弃物承担类似的责任。”^[15]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大型公司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抗争群体,而且来自其潜在的顾客。通过至少下列三种机制,公司对利润的考虑为社会运动提供了独特的经济机会:对正面公共形象的维系、来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股东的压力以及大量潜在的运动参与者。来自现有顾客的正面认可对于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要,但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不得不正视抗议群体的呼声。大量问卷表明,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消费者倾向于避免购买对环境有害的产品。尽管就总体而言一个公司股东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的纷争并不少见。事实上,股东大会经常成为公司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战场。更重要的是,股东常常超越狭隘的自我利益,持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在2002年股东大会上,卡尔佛特资产管理公司要求戴尔重新审视其电子废弃物回收政策,考虑提供全国性的回收服务。类似现象也屡屡发生在其他计算机公司身上。

例如,在惠普公司的一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一项计算机回收的动议获得了8.3%的股东的支持。^[16]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个人电脑的拥有率极高,这些消费者很容易变成回收电子废弃物的倡议者或积极分子。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在CTBC发起的2001年,60.8%的成人拥有至少一部计算机。如果相当比例的顾客加入针对企业的抗议活动,后果将难以设想。

戴尔是高校学生市场上的领导者,CTBC将这一点看作是一个有利的政治契机,因为高校校园往往是积极分子的温床。从2002年3月到2003年晚春,CTBC在20个州组织起了行动,包括:(1)写信给报纸与杂志;(2)搜集明信片抗议签名;(3)给戴尔公司客户服务部发送抗议邮件;(4)展开公共舆论问卷调查;(5)集中于同一天致电戴尔公司客户服务电话;(6)呼吁学校给戴尔公司施加压力;(6)派发宣传光盘;(7)使用夸张化的生化防毒面罩;(8)撕碎戴尔的报纸广告并寄给戴尔本人。

2000年~2003年,戴尔公司的电视广告主打一个别称“戴尔老兄”的广告员。CTBC针锋相对地开展了一轮“有毒物老兄”的媒体行动,并推出了一个名为“有毒物老兄”的网站,在主页上将戴尔广告员和骷髅并置。^[17]2003年12月,学生积极分子以153个校园组织和公共利益研究群体的名义,在戴尔的家乡大报《奥斯汀记事报》上发表了一整版致戴尔的公开信,呼吁后者兑现关于计算机回收的承诺。

2004年4月8日,作为对上述公开信的回应,戴尔发表了一封致全体大学生的公开信,直面计算机回收问题,列出了详细的计算机回收计划和步骤。4月26日,戴尔邀请几十位高校学生和管理人员参加了一场网络会议,亲自聆听了他们关心的问题,并对自己在公开信中的宣誓作了详细的解答。

六、结语

传统的政治过程理论难以解释CTBC的成就,原因有二:首先,传统的政治理论的本意是解释政治运动,CTBC的挑战对象却是计算机制造商,不是政府;其次,政治契机与运动后果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静态的、单向度的关系。对契机的理解不能抛开行动。在成立初期,CTBC并未面临高度开放的契机结构,但它采取的三重策略发挥了显著的成效;换言之,这场运动利用了经济契机结构,打破了政治契机结构,并建构了话语契机结构。这场运动告诉我们,社会运动组织能够与政治契机结构进行积极的互动,并为自己创造政治合

法性。同时,运动利用了经济契机结构中的有利方面,创造了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的对比,给其挑战对象制造难堪,并利用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挑战对象改变其相关政策。除此之外,CTBC 还通过动员高校学生,将电子废弃物问题建构为全球性的道德议题,这种策略为自己塑造了有利的话语契机结构,并成功地将运动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GAMSON.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M]. Belmont: Wadsworth, 1990.
- [2] SARAH SOULE, et al. Protest Events: Cause or Consequence of State Action?[J]. Mobilization, 1999, 4(1): 239-255.
- [3] JACK GOLDSTONE. The Weakness of Organiz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0, 85(5): 1017-1042.
- [4] PATRICIA HIPHE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 Outcomes[C]// MARCO GIUGNI, et al. From Contention to Democra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149-167.
- [5] EDWIN AMENTA. When Movements Matter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14.
- [6] NICOLE RAEBURN. Changing Corporate America from Inside Out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 [7] T. REED. The Art of Protest[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 [8] FABIO ROJAS. From Black Power to Black Studie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 [9] WILLIAM GAMSON, DAVID MEYER.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C]// DOUG McADAM, et 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75-290.
- [10] XIE, LEI, HEIN-ANTON DER HEIJDEN.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J].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10, 9(1): 51-68.
- [11] JOHN McCARTHY, MAYER ZAL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6): 1212-1241.
- [12] RUUD KOOPMANS. Movement and Media [J]. Theory and Society, 2004, 33(3-4): 367-391.
- [13] DAVID WOOD, REBECCA O'MALLEY. Dude, Why Won't They Take Back My Old Dell[R/OL]. 2002.http://www.grm.org/e-scrap/Dell_TakeBack_Report.pdf.
- [14] CTBC. Goal [R/OL]. 2002. http://www.grm.org/e-scrap/index.bak.html.
- [15] CHAD RAPHEL, TED SMITH. Importing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for Electronic Equipmen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C]// TED SMITH, et al. Challenging the Chip.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6] OECD.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R/OL]. n.d. http://www.oecd.org/document/19/0,3746,en_2649_34281_35158227_1_1_1_1,00.html.
- [17] CTBC. Dell Shareholders Urged to Examine All Aspects of Company's Performance[R/OL]. 2002. http://www.ecologycenter.org/iptf/northamerica/Dellwaste.html.
- [18] SVTC, CTBC. 2005 Report Card for Computer Manufacturers [R/OL]. 2005. http://www.etoxics.org/site/PageServer?pagename=svtc_computer_report_card.

(责任编辑 洪小良)

Abstract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being overly structuralist and for only focusing on political movements. Instead of abandoning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expand the notion of opportunity, which contains political opportunity, economic opportunity, discursive opportunity, and to understand it in the context of action. The theoretical proposal is illustrated by a case study of 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U.S. Computer TakeBack Campaign. The campaign's achievements can be attributed to its active engagement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s. This case study shows that a revised understanding of opportunity may restor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Key words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y; economic opportunity; discursive opportunity;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